

对高考状元，不要神化也不要贬低

社会热点

□秦淮川

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查阅了 1977 年到 2009 年 32 年来全国的 124 名高考状元,称“他们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”。消息一出,不少网友纷纷感叹,高考状元中看不中用,高考状元一个个只不过是机械的做题机器和考试高手;还有人反思高考状元毫无建树,谁之过?

在不少人眼中,曾经的高考状元们简直一无是处、一文不值、一无所有。高考状元真的全军覆没了吗?从他们的职业状况上我们能看到,他们中间有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,有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,有中科院博士生导师、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,也有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、美国长岛大学教授、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、加州大学博士生导师,还有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、法国第戎大学教授……一个个都颇有成就,咋就全军覆没了?难道个个发大财、做大官,才不是全军覆没?难道一个个像马云、马化腾、李彦宏才算有成就?在这里,得插上一句,李彦宏其实也是高考状元,

1987 年他作为山西省阳泉市高考状元进入北京大学,就读较为冷门的图书情报专业,后出国。有人会说,高考状元固然混得不错,但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。试问,何谓领军人物?领军人物是一个很难量化的模糊概念,难道只有当上院士、获得诺贝尔奖才算领军人物,在大学里做博导、在名校里当教授,就不领军了?所谓“高考状元全军覆没”这样一个命题,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危险的价值观:“有大钱,有大权,才算成功”。如果不带有偏见的话,这些高考状元的成材率还是挺高的,起码远远高于非状元。昔日的高考状元能够保

持较高水准,就具有正面的导向意义。我们没有必要对高考状元抱有过高期待,也不能规定状元必须成为各自所在行业的佼佼者,要求他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状元。对待状元,我们既反对过度炒作,丧失底线的神话高考状元、消费高考状元,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,即全盘否定高考状元,把高考状元贬低得毫无价值。当然,人们之所以贬低、嘲讽高考状元,其醉翁之意不是蹂躏高考状元,而是剑指应试教育。应该承认,应试教育有改革之必要,但不能因为对应试教育不满,就否定高考制度,也不能因为高考制度需要改革,就把板子打在高考状元身上。

当前,炒作高考状元确实已经成了很庸俗的社会现象,应该降温。同时也应该看到,如果应试教育依然存在,状元热就不可能降温。哪怕是素质教育真正贯彻下去了,只要有考试存在,总会有第一名,就一定有状元。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,高考同样有第一名存在。而对于美国不少名校来说,他们录取考生时,并不会只盯着第一名,而是更注重考生的综合素质,这倒值得我们关注。中国人的状元情结从没有消失,可以预见的是,短时间内不可能消失。关注高考状元的成才率、职业发展不是坏事。对待状元,我们需要一颗平常心,而不是陷入两种极端。

画中有话

□文/陈家沛 图/王成喜

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前主管王文(化名)3 月 16 日向相关部门投诉其遭用人单位乙肝歧视(被调去上厕所)。近日广州市人社局给予回复,认为目前无证据表明该公司有违反《就业服务就业管理规定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。在这家公司的体检中,实实在在进行了乙肝两对半的检查。对于这样的事实,人社局却说没有证据表明违反了该规定。如果没有违反这个规定,王先生及其余 11 名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如何被发现的?事实难道不是最有力的证据?违反国家相关规定,做了不应该做的检查,这已经是错误了,更甚的是“公司的黑板上还写出了 12 个被查出乙肝病毒携带的员工名字,整个公司的人都认为我们患乙肝”。公司将私人信息张榜“广而告之”的做法,又涉嫌泄露个人信息,也是非常错误的,是一家公司所

不应该做的事。从这里也可以证明,公司不仅违反了《就业服务就业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,而且走得更远。最重要的是,当王先生被非法检查出乙肝病毒携带之后,从主管一下子变成了一线员工,之后又被安排去客房部打扫卫生,洗沙发,清厕所,值夜班,还要搬石头,种树除草。工资也从主管级别的 3000 元下降到 1784 元。王先生的这一系列变化,不是因为在此期间他的工作出了什么差错,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查出乙肝病毒携带。自从王先生被查出乙肝病毒携带之后,发生在他身上的工作及待遇上的明显变化,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歧视,反倒是明明白白的“重视”了?《就业服务就业管理规定》要被认真执行,人社部门必须履行好监管职责,对于违反者依法进行处理,以维护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权威性,也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。



如何看警察翻 5 吨垃圾帮外国人找护照?

□毕晓哲

31 岁的俄罗斯人谢尔盖,第一次来宁波谈业务,想买点机器回去。业务还没谈好,他却因为马虎,把装着护照的包给丢了。惊慌失措的他,找到了镇海警方。警方一查,原来是清洁工误把他的包当成垃圾,丢到垃圾桶了。民警在翻找了四五吨垃圾后,终于找回了护照。在我看来,在我国,发生外国人丢东西“找回来比较快”的现象,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不排除国内有部分不良风气,如自私自利、唯利是图等,但不能否认,我们的民间传统依然是纯朴的,对于“外国人”或“外乡人”本身就有一份发自内心的“好客”啊、想帮助帮

助啊等传统型的热心。一些外国人在国内受到部分人的热情帮助,甚至是一些警察的热情服务,说白了本质上与中国人的热情好客的传统有关——在多数人骨子里恐怕还是不愿意让“远方的客人”受到委屈和损失的,这种心态不仅反映在了部分国人意识里,也潜意识折射到了基层民警身上。所以,出现“某日本人丢车后全城找车”、“某外国人丢失马匹后,警察徒步 20 公里找寻”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当然,在一些类似的“迅速破案”和“翻四五吨垃圾也要找”事件中,究竟有没有来自上面的“压力”?或者说“面子”问题?又或者,究竟有没有因为外交压力或其他政治性的考虑?应该是有的。这

个现实也不能回避,毕竟外国人的背后有其国家背景,就如广州市发生非洲人死亡事件后,该死者所属国迅速“照会”和“关注”就是这个道理。完全不考虑外国人性质和外交背景,是不符合社会实际的,也与国际交往惯例不符。随着国家日益强大,公众自信心日益充足,外国人在我国也越来越不稀罕。因为一个外国人就让中国人或中国警察“高看一眼”?这种可能性并不高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应归结于国人的“好客”情结。再者,从法律意义上统观上述几起“外国人丢东西事件”,我们看到了公众和警方的热心,却并没有看到“法外特权”,也没有看到警察违反法定程序对外国人实施什么“特殊

的优待”。至于办案效率与国内似乎有高低之分,并不是说明“专门”给外国人“提速了”,而是侧面说明在国内警察办国内案件的时候相对而言“窝工”、“磨洋工”和推诿扯皮现象比较多而已。如果剥离掉现实中警察队伍中存在的“推诿扯皮”现象,个别警察对公众求助事件的漠不关心问题,如“补足”国内案件办案时的短板,外国人案件和中国人案件自然会是一个“程序”、“一个结果”、“一个时间”。也就是说,外国人案件并没有获得什么“特权”(这原本就是正常履职),而是一个与部分不良国内办案“对比”和“参照”之下的产物。这其实也给服务公众的警察,提了一个如何履职服务公众的醒。

“五星”典礼是丢西瓜捡芝麻

□林小明

给孩子一个“五星级的毕业典礼”,不知道作为家长而言,是高兴还是别扭?昨日记者从禅城一所幼儿园了解到,该幼儿园计划把毕业典礼设在佛山一所五星级酒店,大人和小朋友加起来需要收取 200 多元。像这样把毕业典礼搬进五星酒店的初中、幼儿园开始逐渐多起来。就像《西游记》、《还珠格格》等在电视上播出时,就意味着暑假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到来。每当校园响起“当离别拉开窗帘……”时,总是提醒人们毕业季到了。而如今的毕业告别,也越来越具有仪式感:有

人拍“红宝书”照,有校长用各种入世的方式致辞,而有人则将毕业典礼,加上了“五星级”等定语。如果说以各种奇怪方式作别青春,还属个人自由选择时,人们或许只有发出一声叹息,还真不好说三道四;当校长们冒着各种流行语致辞时,我们还能理解为他们与时俱进,用赶趟的方式在进行劝诫或上“最后一课”;但当幼儿园的毕业典礼,都要世俗化地以在五星级酒店举办为荣时,就让人坐不住了。幼儿园在五星级酒店举行毕业典礼,要看上去合理,似乎并不困难,不用打灯笼就能扒拉来一大堆。只是这些理由,是否都能站住脚就

存疑了。在潜规则渐已演变成规则的当下,这种典礼的背后,是否隐藏着难为人道的利益纠葛呢?否则,怎会如此攀比着接二连三地出现?有时在自愿的幌子下,更多学生和家長是被自愿。原因很简单,当少不更事的小孩,仍是幼儿园学生时,就像曾有人开玩笑所说那样:这么小一人质在他们手上,谁还敢不听“挟幼多以令家长”的老师呢?幼儿园更多的该教孩子行为规范,而不是向他们言传身教,利用难以监督即将过期的权力雁过拔毛。并非怀疑幼儿园举办五星毕业典礼的初衷,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,确实让人不甚待见:以掏家长腰

包的行爲,污染了本该更具有意义的典礼,还落下了弄权自肥的口实,更可能给孩子们留下坏印象,原来找个理由就可以炫耀性消费,原来大家不这样就显得很没面子。物质化排场化的五星毕业典礼,不是我们想要的“五星”。而所谓的隆重,其实并非要体现外化的豪华,而在于情感的维系及倾诉,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的个性化校长,以超越平常的方式表情达意时,总会受到热捧的原因。白纸般的幼儿毕业典礼,需要汲取其中精华,为孩子们指引更为积极的人生方向,而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般地向着庸俗化靠近。

回归 15 年 香港不再陌生

□祁乐鑫

那里和这里,人员接触、交流和融合,与一国范围内所有地域相同,最初以旅游形式,以后以商贸方式,现在则以考学和就业模式。香港,对我等 40 岁以上大陆群体,曾经是一个陌生以至神秘去处。30 年前,但凡有人从香港来或者路过香港,所带礼品,或是港货、或是日本货,多半是电器,多半是稀罕物,多半让人艳美。15 年前,但凡有人从香港来或者路过香港,大多谈及回归前夕现象种种,政治多于经济,所带货品少了许多,所送礼品已经无多印象,显现那里与这里就商品而言差距不再明显。如今,去香港“扫货”者不少,限于特定消费群体和特定商品,价格差距使然,那里依然是购物“天堂”。涉及香港,热议话题多与社会相关。至于经济和政治话题,无论那里或是这里,一国范围以内,趋大同而存小异。香港,整体不再陌生和神秘,局部肯定有陌生以至神秘去处,只是周边同辈中,时常有人去那里短期出差或长期上班;晚辈中,已然有多人在那里上学、去那里实习,或许会在那里找到人生第一份职业……在晚辈眼中,或许,香港只是一座城市,提供一片职场。那里和这里,人员接触、交流和融合,与一国范围内所有地域相同,最初以旅游形式,以后以商贸方式,现在则以考学和就业模式。

其实,无论 30 年或者 15 年,对晚辈,可能够长、够久;对我辈,可能容纳人生一大段经历、阅历;而对这个国家,对国家历史,无论如何只构成短期记忆。长期记忆中,香港,有过“港督”,英国人;香港地面上,升起过“米字旗”,英国国旗。那是昔日强权帝国百年殖民,是我族百年屈辱和伤痛,是吾国百年纠结和饮恨。那里和这里,隔着不止一条河……屈辱和伤痛,纠结和饮恨,15 年前有了一断。那一天,香港回归,眼见电视直播画面,脑际回响两段音乐旋律,一段是交响诗《我的祖国》,出自捷克作曲家贝德里赫·斯美塔那;另一段是《回家乡》,作为交响曲《自新大陆》组成部分,出自捷克作曲家安东·德沃夏克。那以后,最近这 15 年间,对《我的祖国》和《回家乡》,时常有新体验、新感触。正因为这两段交响乐,得益音乐的渗透力,香港不再陌生,不限于物理意义,而扩展至感情层面。下一次,庆祝回归,或许 20 周年,再听这两段,一定更不陌生。

广告